

引 言

刘淑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今昆明的中青年一代，很少有人知道她。

刘淑清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新中国建立前后，她曾以刘董事、刘经理、刘太太、刘院长、刘妈妈、刘参议员、刘委员、刘代表等不同的称谓，名闻遐迩，老幼皆知。

她去世三十多年了，但是，县志里有她，文史资料里有她，史学论著里有她，报告文学里有她，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里也有她。

有人说，她是红土高原上的“宋庆龄”；有人说，她是中国的“阿信”；也有人说，她是“半世纪前风云昆明的奇女子”。

她，既在事业上生财有道，又为云南和平起义作出贡献；既从事商业活动，又收养孤儿弃婴；既是旧社会的参议员，又是新中国的人大代表；既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周恩来的鼓励，又被扣上“美蒋特务”的帽子……

个人命运的曲折坎坷，折射着时代政治的风云变幻。

那么，就让我们透过尘封的档案、发黄的报刊和采访中得到的素材，沿着历史的足迹，看看她的一生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一 盐津惨祸

刘淑清，四川简阳人，1904年生。祖籍福建，移居四川已有好几代了，到刘淑清出生之际，家道已经没落，只靠几亩薄田度日。父亲刘士美，清朝年间中过秀才，是一位饱学之士，但在县里只谋到一个录事的差使，整日抄抄写写，年末回家，连肉都买不起一斤。母亲谢蕴如，是一位善良能干的家庭妇女，在家中极有威望。她不识字，但从丈夫那里学到许多待人接物的道理。她缠足，但是行动利落，非常勤劳，双手很灵巧，成日不停地做家务、绣花、为人洗衣服。在家境日渐贫寒的过程中，独自担负起安排家庭生活的担子。为了节省，她洗衣服用的是皂荚，领口袖口才抹一点肥皂。

尽管家道中落，刘家还是先教孩子识字，读些儒家经典。后来又把小小年龄的刘淑清、刘玉清姐妹俩，送到百里外的成

都就学。这种重视女孩子教育的情况，在男尊女卑的民国初年是很少见、很可贵的。刘淑清后来表现出来的许多优点：慈爱善良、温文尔雅、知书识礼、精明干练、重视教育等，都是父母熏陶的结果；显然，她的性格受母亲的影响更多一些。

刘淑清姐妹两人，在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成都华美女子学校，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华美女子学校管理很严格，除了要学生学好功课外，还要求学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打扫教室、清理宿舍、做手工等。她们的刺绣作品和钩针制作的花边、桌布，都要运到国外去义卖，为学校募集经费。刘淑清心灵手巧，常常把钩花的报酬节省下来，资助弟妹上学。这种工读合一的教学方法，给刘淑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使她从小养成自食其力和乐于助人的好习惯。二十多年后，她创办坤维慈幼院时，几乎原模原样地搬用了这套教育方法。

华美女子学校的学习生涯，使她在相当闭塞的四川内地，接受了完全陌生的西方教育，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事情。由此可见，她的父亲既传统，又开明。

在她的青少年时代，儒家“仁者爱人”的处世之道，基督教文化中平等、博爱的观念，对她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她树立了一个期望社会合理，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在她以后的岁月中，总有好心人热情相助，使她相信世上总是有好人，总是有热心助人的人，深深懂得在困难中得到别人帮助是多么的重要和珍贵。

刘淑清从华美女子学校毕业后，在启化小学任教务

长，从此，她与儿童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3 年，她和刘柏君结婚。

刘柏君，云南盐津县人，早年孤苦，只身到昆明求学。曾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兵，后来成为“云南王”龙云属下的军官。一说，他曾任过龙的副官长。

1917 年 4 月，北洋军阀段祺瑞宣布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南方“护法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唐继尧当选为滇军元帅。唐响应号召，组织西南护法联军，自任靖国军川滇黔联军总司令，率部攻入四川，1918 年 2 月，攻克成都。经过三年混战，到 1920 年 10 月，滇军战败，退出四川，护法运动结束。

就在这段时间，刘柏君曾带领滇军部队驻扎简阳，结识了刘士美一家。那年月，百姓都怕军人，军队一到，家家关门闭户，逃之夭夭。刘柏君在街上只遇到一个大胆看热闹的孩子，就是刘淑清的弟弟子杰。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很是投机，子杰把他带到家中。刘柏君相貌堂堂，双目炯炯有神，既有威武的军人气质，又显得温文儒雅，彬彬有礼，而且又是刘氏“家门”，立即得到刘士美夫妇的好感，回家躲避兵乱的刘淑清姐妹也不回避他。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军人，尊称他为“宗兄”。

不久，他离开四川，回到云南。但无论转战到哪里，总不时向刘士美夫妇报告行踪。他固然记得忘年之交的刘老先生，更忘不了那位亭亭玉立、清秀脱俗的少女——刘淑清。所以，待刘淑清年龄稍大一点，他就开始给她写

信。那时候，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还很浓厚，异性通信是很新鲜、很时髦、也很刺激的事。只因为刘淑清接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才能够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和这位最先走进她内心世界的军官鸿雁往返。他们由友谊开始，一来二去，渐渐谈到了婚配。刘淑清本以为赏识柏君的老父会欣然应允，却不料素来开明的刘老先生大为不悦，一口拒绝。他之所以反对，其实理由很简单：“同姓不通婚！”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不容半分差错。他既怪刘柏君不遵古礼，孟浪行事；又怪刘淑清擅自主张，点头同意。在他的潜意识里，更不愿意心爱的女儿远嫁异乡。与此同时，成都的基督教会也持反对态度，他们不赞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与一个异教徒婚配；而且，他们正要把品学兼优的刘淑清培养成教会学校的骨干，怎么能让她跟着一个异教徒到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去呢。

但是，刘柏君的影子早已铭刻在她的心头。她虽然敬爱父亲，也尊重教会，但她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终身大事上，父亲左右不了她，教会也动摇不了她，她一点也不退让，显示了出乎意外的固执。在刘淑清的坚持和母亲的劝说下，守旧的刘士美终于摒弃传统观念，跋涉数百里，亲自陪送女儿到穷乡僻壤的云南省盐津县牛塘坝（老人传说，曾有犀牛到塘里洗澡，故而得名）完婚。牛塘坝村家家姓刘，多少带点亲缘关系，当初都是从江西迁来的，互相都用“老表”称呼。那年，刘柏君二十八岁，刘淑清十九岁。从处理婚姻大事上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柔中有刚、意志坚强、有主见、有反抗精神，认定目标就不动摇的人。

婚后不久，刘淑清就随刘柏君到了昆明。他们感情深厚，先后生了三个女儿。刘淑清常常为没有男孩而遗憾，刘柏君却显得豁达大度，高高兴兴地说：“河里无鱼虾也贵！”这不仅仅是自我解嘲，他确实认为鱼虾无贵贱之分，因而为三个女儿取了男孩子的名字：自强、自鸣、自勤。

刘淑清一面在昆明育贤女校任教，一面操持家务。她结识了两位好朋友：一位是龙云的夫人李培莲；另一位是卢汉的夫人龙泽清，刘淑清的孩子唤她为四孃。在她后来遭受厄运的时候，两位好朋友都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她还结识了其他一些官绅太太，这对她后来的事业，也有不小的帮助。

20世纪20年代，是军阀混战、征讨频繁的时代。刘柏君常年带兵在外，先是跟着唐继尧打顾品珍，后来又追随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在1927年发动“二六兵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接着，发生老昆明人所说的“唐三攻城”事件：驻滇西的唐继尧残部，在唐继虞的率领下，组成有唐继麟、欧阳好谦、俞沛三个师的“西军”，在大理招兵买马，扩编队伍，兴师问罪，扬言为乃兄报仇。“西军”前锋曾到达昆明大南门外顺城街西端的烧猪桥，昆明危在旦夕。刘柏君率部抵抗，坚守不退。龙云急调朱旭师来昆救援，向唐军发动反攻，唐军战败，被迫撤走，唐继虞宣布下野。龙云论功行赏，刘柏君渐次升到旅长。

接着是龙（云）、胡（若愚）等人争夺云南统治权的内战。后来，龙云逐渐占了上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顺水

推舟，在 1928 年 1 月 17 日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过了四天，又任命龙云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云南政局才慢慢稳定下来。

刘柏君文武兼备，屡立战功，从护法战争时期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逐渐飚升，三十岁出头，已获得少将军衔，是龙云部下一位风华正茂的少壮派将领，在小小的盐津县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人们都夸他有出息、有志气，但也有傲气。

正当龙云终于夺得云南的统治权之时，前程难以限量的刘柏君却毅然辞去军职，解甲归田。辞职的原因，主要是对长年累月你争我夺的混战产生强烈不满，对军旅生涯感到十分厌倦。但是，他才华出众，锋芒毕露，既让同僚眼红，也遭长官猜忌，因而不想在官场中倾轧，也可能是一个理由。

为了维持生计，积蓄资金，他在昆明顶下一家原名“沁芳园”的茶社，改名为“大华交益社”，留下母亲和两个小女儿照看。自己带着妻子和大女儿，于 1928 年春回到盐津牛塘坝老家。

盐津县属于昭通专区，地处滇东北高原的斜坡地带，东邻四川筠连县。本是古“五尺道”上的咽喉重镇，“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途，又是川滇交通要道。古书记载：“森林广布，罗连蛮落，山峻以堕，路险以迂，地偏僻以荒，溪深以激，嘉木之所植，得永其寿年，而其质异常。明成祖采大木于此，尽人力不得出，有司苦之木，自行震动山谷，而其乃称神。”资源条件虽好，经济、文化

却相当落后。到 1949 年，全县才有一所公办中学，50 名学生；14 所公办小学，1 100 名学生。牛塘坝距县城五十里，是牛塘乡乡政府的所在地，却是一个很小的村子。1980 年人口普查，全村才有 338 人，七十多年前，那就更少了。这里的条件，不要说和昆明无法相比，就和简阳相比，也远远不如。简阳在四川中部的矮丘陵地段，沱江贯穿全境，水陆交通发达，冬暖夏热。牛塘坝则是地地道道的穷乡僻壤，海拔比简阳高出四五百米，冬天很冷，多雾、多雨、湿气重。

由于这里地少林多，刘柏君夫妇就广种茶树，植桑养蚕，立志开发农林事业。虽然耕作条件很差，生活艰苦，但他们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乐在其中。

正当他们一心一意安排耕读自给的生活时，政坛上的变动打乱了平静的生活。

胡若愚与龙云争夺云南政权失败后，率部退到四川，后来得刘文辉的接济，组织“靖滇军”，从四川反攻云南，经过川滇通道——盐津时，胡委任了县长。龙云出兵征讨，胡若愚兵败退走，他委任的县长将县府洗劫一空后逃跑。地方紊乱，无人出头，当地父老推刘柏君收拾劫后残局。龙云本来可以顺理成章，正式委派刘柏君继任县长，但却另派开远人万景增任县长。由此可以想见，龙云对刘柏君辞官回乡的事耿耿于怀，甚至怀疑他可能与胡若愚有瓜葛，对他放心不下。

过了不久，灾祸突然从天而降。

那年夏天还没有过去，四川军阀的一支队伍，突然袭

击牛塘坝，不知是由于早年滇军人川结下的夙怨，还是出于对刘柏君无端回乡而产生的疑惧。刘柏君全家和一些乡亲被困在一个碉堡里，在缺粮、缺水、缺弹药的困境中奋力抵抗了三天，所有棍棒、家具、石块、砖头、石灰，都被用来当作武器，投掷一空。最后一天的夜里，刘柏君凭着对地形的熟悉，趁敌人熟睡的时候，带着乡亲，分成几路，在茫茫夜雾掩护下，穿过茂密的包谷地，突围出去，悄悄向六十里外的县城转移。他们打开碉堡门时，发现门外堆满柴火，原来敌人已经准备纵火焚烧，幸好及早逃出，免遭一难。次日凌晨，扑了一空的敌人，为了泄愤，大肆抢劫之后，又把整个村子烧得干干净净。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成了一桩疑案。

第二天，大家平安到达县城。他们庆幸逃脱了一伙明火执仗的匪徒的魔掌，却万万没有料到，等待他们的竟会是一场更为凶险的谋杀。

他们受到父老士绅的慰问，更受到县长万景增非常周到的接待。万早年在昆明的时候，十分潦倒，曾得到刘柏君的提携和举荐。所以，对于万的殷勤，谁也没有产生一丁点的怀疑。一天中午，万景增在县衙宴请全城知名人士，为刘柏君接风洗尘，刘柏君高高兴兴去赴宴。那知他前脚才走，一队武装士兵后脚就跟来，他们气势汹汹地闯进刘柏君的住宅，佯称有逃兵窃走枪支，要在全城搜查，不问青红皂白，就取走了刘柏君留在家中的手枪和步枪。刘淑清万分惊讶，疑虑重重之际，忽然听见县衙门枪声大

作，顿时雷雨交加，全城惊恐不安。事后得知，有几名凶手出其不意，冲进宴席，当着客人的面向刘柏君开枪。客人四散奔逃，刘柏君头部中弹，当场身亡，年仅三十五岁。

这次谋杀的起因，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万景增出于鱼肉百姓的目的，妄图杀一儆百，踢开绊脚石；又有人认为，万景增见刘柏君弃官回乡，梦想利用某种矛盾，邀功请赏。后一种猜测，比较接近真实，事情是这样的：

刘柏君弃官回乡时，龙云接受了周钟岳“安内治外”的建议：对内，花大力气整顿内务，清除异己，巩固权力；对外，联络驻外滇军，消除敌意，互相提携，为统治云南奠定可靠的基础。对于刘柏君的离他而去，龙不但不理解，可能还多少有些怀疑。他在任命万景增为盐津县长时，就嘱咐万打听刘柏君的情况，“注意”一下刘柏君的动向，“相机办理”。而万景增邀功心切，误解了龙的意图，认为龙要借他的手“清除异己”。正愁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不料天赐良机，刘柏君自投罗网，落在他的手心里。于是，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摆下“鸿门宴”，毫不犹豫地下了毒手。

民国年间，陈一得先生编纂的《盐津县志》（初稿）记录了这件事：“民十八年九月，伪县长曾庆曦潜逃，县政无主，兵匪充斥，混乱不堪，盐津民众乃推在籍旅长刘柏君临时出任，维持地方。”“旋委县长万景增到津，……发生误会，诱杀刘柏君于县政府内。”可见，万景增诱杀刘柏君一事属实，但所叙原因不确。显然，如果没有龙云

对刘柏君的疑忌，万景增决不敢轻易枪杀一位卸任的少将旅长。

1984年版（盐津县志）和1994年新版（盐津县志）对此事均有记载。

龙云这个人具有很浓厚的儒家思想，念旧、尊老、爱才是他的美德。而他最显著的优点是念旧，大凡对旧长官旧部属，他都怀念在心，常常有所照顾。当初对万景增的嘱托，或者是出于对旧部的怀念和关心，或者是为了弄清刘柏君回家的真实想法，或者是要查清刘柏君、胡若愚之间有没有瓜葛。但他大概并没有杀害刘柏君的动机，也没有杀害刘柏君的理由。只是嘱咐万景增时没有把话说透，加上所托非人，才酿成了这场悲剧。应该说，刘柏君虽非龙云直接所杀，而事情由他而起，他在道义方面的责任是难以推卸的。

再说，凶案发生后，接连有人隔着墙板，悄悄向刘淑清通报刘柏君被害的消息。事出意外，刘淑清如同五雷轰顶，悲痛万分却又不知所措。事隔不久，警察局长来到家中，说城里出了事，为了保障母女俩的安全，请暂时到警察局躲一躲。这个举动显然出自万景增的指使，他要先把刘淑清软禁起来，再设法斩草除根，掩盖真相。可能这位警察局长良心尚未泯灭，对刘淑清还比较温和，他把刘淑清安置在警察局的一栋房舍中，亲戚朋友可以前来探望。随后，万景增出了一张告示，说刘某图谋不轨，奉命将其就地正法云云。但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城里议论纷纭，招致越来越多的质问和评论，万景增只好紧闭衙门，

偷偷把刘柏君的遗体放在几块木板里，趁夜深人静之际抬出，打算一埋了事。此事被百姓发现，告诉了刘淑清，她当街拦住棺木，一面痛哭，一面拿衣服擦拭流到地上的血迹。个弱女子呼天抢地的呼号、血泪交加的诉说，惊动了城中百姓。霎时间，人越聚越多，纷纷表示义愤，全城大哗。万景增无奈，只得听任城中父老出面，隆重装殓刘柏君的遗体，并且准许亲属护送棺木回乡安葬。

过了几天，刘淑清听说万景增要把她转到县衙，预感到凶多吉少，在亲友的协助下，她带着大女儿，躲过警察局的监控，与从乡间赶来的小姑和过继儿子会合，连夜逃往昆明。等万景增察觉的时候，她们已经到达昭通，越出了万景增的势力范围，才没有被赶尽杀绝。

刘淑清一行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到了昆明。她立刻带着三个幼女，找到龙云，哭诉万景增的暴行，要求讨个公道：刘柏君为云南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凭什么把他置之死地？龙云这才知道万景增处事孟浪、操之过急，铸成了大错，显得十分尴尬，当即通令追捕万景增。

刘淑清打算安排好家务后，回到盐津，完成刘柏君未竟的事业。但龙云、李培莲夫妇认为，她一个妇道人家，在那个偏僻小村，做得成什么事情？而且很不利于孩子的教育。为此，他们帮助刘淑清安顿下来。从此以后，龙云夫妇对刘淑清多方照顾。李培莲病故后，龙的后继夫人顾映秋继续对她的事业给予尽可能多的支持，以多少弥补龙的过失。刘淑清的另一位好朋友龙泽清，自然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一年，刘淑清只有二十六岁，三个女儿，分别是五岁、三岁和两岁。她那柔弱的肩头，独自挑起了照顾亲属和抚育孩子的重担。

以后的十多年间，万景增因被云南省政府撤职查办，不敢回来，长期流落在外。据开远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查证，龙云下台之后，万景增不知通过什么手段钻营，于1949年1月2日接任开远县长，兼任县自卫队总队长；12月成立临时戒严司令部，自任主任。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后，余程万指挥国民党二十六军，会同第八军进攻昆明，万景增为二十六军筹办粮草。1950年1月8日，他被余程万的云南绥靖公署任命为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1月10日万交卸了县长政务，11日率部卒到个旧上任。位子没有坐稳，二十六军已经溃败，万追随不上，便潜回开远乡下。1月18日开远解放，万终因作恶多端当晚被逮押回城交军队看管。1950年11月2日，在开远县首届农民代表大会上，经农民代表控诉，人民法庭宣布判处万景增死刑，当日在开远执行枪决。可惜的是，只算新账，未算老账，没有追究他谋杀刘柏君的往事，以致一桩公案，再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答案了。

人生的道路是难以预测的。如果不发生这场灾变，也许刘淑清会成为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那个边远的弹丸之地，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她就没有可能创造出令人钦敬的事业，展示其绚丽多彩的人生。由此可见，对每个人来说，灾难固然是打击，是挫折；同时也是挑战，是机遇。就看你怎样面对它，把握它。

二 创业初步

柏君去世后，乡下的房产已经被火烧光，只留下一些田地和一個茶社。刘淑清面临着养活一大家子人的艰巨任务：上有婆婆，下有自己的三个孩子，还有乡下接来的柏君的姑姑、两个堂弟和一个堂妹。她要养活三代人，还要抚育孩子，让他们都能上学。

婆婆心疼惨遭不幸的儿媳，由百般挑剔变为通情达理，事事体贴媳妇，尊重她的意见，还主动揽下料理家务、照看孩子的琐事。刘淑清一面在恩光小学任教，一面接手经营大华交益社。婆媳二人相依为命，共度难关。茶社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艰辛。

每天早晨，她送孩子上小学和幼儿园，晚上，她常常给孩子讲故事，美国黑奴生活啦，聪明的兔子和狡猾的狐狸斗智啦……让孩子高高兴兴地受到启迪。孩子

长大一点以后，她更加繁忙了。但她从来没有忽略孩子的教育，抽空和她们一道读《西游记》、《三国演义》，热烈谈论那些引人入胜的“锦囊妙计”。放假期间，她坚持请老师辅导孩子学习。她也抽空带大家到翠湖、大观楼散步闲谈，或者去看电影。一遇到吵架斗殴的事情，她就把孩子带开，既怕招惹是非，也怕孩子沾染恶习。

20世纪30年代初，昆明出现了“贵族学校”——南菁小学和后来的南菁中学。那是昆明第一所寄宿学校，学费很贵。云南的军政要人、富商大户，都送子女去入学。这时候，大华交益社的收益，可以使全家过上简朴温饱的生活，但要让孩子读南菁，就感到很拮据。有时要把婆婆的首饰拿去当铺抵押，才能凑足学费。但为了孩子的前途，她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把孩子送了进去。

后来，牵肠挂肚的父母，带着儿子子杰，离乡背井，千里迢迢迁到昆明，与居孀的女儿做伴。刘淑清参加了云南省的“收厘金”——“投标包税”。她承包了昆阳等三个县的烟酒牲屠税，让父亲和弟弟操办。每年缴纳给财政厅中标数目的税款后，余款归己，有着不菲的收入。这样，家庭经济才比较宽松。父母在精神上支持她、安慰她，孩子们在母爱的温暖里健康地成长起来，丧夫的痛苦稍稍得以减轻。

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日子并不长久，打击又接踵而至：先是婆婆和父亲相继去世，接着，二女儿经过一场严重的脑膜炎后，双耳失聪。亲人的丧失，使她万分悲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化；然而，女儿的残疾，却是

她终身牵挂的一块心病。但她坚强地面对这一切，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全力经营大华交益社。

大华交益社位于正义路中段邱家巷口（现今艳芳照相馆所在处）。北面，是省府所在地——五华山；西面不远的甘公祠街，是市府所在地；朝北左转，是文庙；朝南边走几步，就到三牌坊。各行各业最大的商店、茶楼、酒馆云集于此，是当年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区。大华交益社的位置，正是一块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每逢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灯会在三牌坊下举行，各种各样的彩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照耀得如同白昼。卖灯人，买灯人，提灯游行的人，摩肩接踵，把临近三牌坊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而观灯的人，老早就在茶社里占了座位，高谈阔论，尽情观赏。

大华交益社是一个庭院式茶社。它门面不大，走过一小段门道，是一个小天井，迎面是柜台，三进天井连接三进平房，天井上盖有四面通风的瓦顶，宽敞透亮，清洁舒适。第三进天井的墙上挂着刘柏君的大幅戎装画像，那是刘淑清的精神支柱。里里外外摆几十张茶桌，桌椅并不考究，但是清洁整齐，使客人感到心情舒畅。留声机放着流行歌曲，顾客既品茶又可一饱耳福。训练有素的茶房，热情周到地忙里忙外，给客人送上沱茶、普洱、龙井、菊花、茉莉、碎红、碎绿。还供应各种零食：盐炒瓜子、五香花生、焖松子、兰花根、金钱酥、油酥米花糖、老刀牌香烟、美丽牌香烟……也出借象棋、撮牌，后堂附设浴室。有时也请艺人清唱，雅俗共赏，为客人助兴。客人虽

多，但忙而不乱，形成一个消闲、娱乐、交际的好去处。茶客都夸奖这里水滚、茶香、烟筒好。每晚华灯初上，顾客盈门，座无虚席，成为工商界、知识界的“俱乐部”。三教九流的人，老板、店员、公务员、青年学生，都喜欢来这里商谈买卖、排解纠纷、休闲谈天、消愁解闷和复习功课。

刘淑清接手茶社后，很快就显出良好的素质和卓越的管理才能：事无巨细，她都要亲自过问，责任越大，勇气也越大，知难而上，决不退缩；偶有病痛，总是咬牙顶住，不轻易躺下。每逢招收“茶房”，她都要亲自挑选，等他们看熟做会、手脚麻利了，才准出堂招待客人。她很注重质量，出售的广黄烟，是地道的上等货；出售的粽子，先要用水泡，把空壳、杂质去掉，再洗净煮熟，颗颗饱满爽口。

她对员工的管理，要求严格而不失人情味，分工明确，检查严格，待遇较好。年老的受到尊敬，年轻的得到培养，十多个员工和和气气，相处得如同一家人。茶社占着“地利”，又有了“人和”，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到了年底，每个员工都能得到一个红包，皆大欢喜。大华交益社也就成了一个顾客盈门、声名远播的茶社。附近的华丰茶楼，五开间三层木结构的大楼，占地 200 多平方米，门面很大，卖茶之外，兼办筵席和红白喜事，还设有“哈哈镜”、滇戏清唱，是著名的老字号。但是经营思想守旧，管理方式落后，封建气息浓厚，竞争不过大华，不久就倒闭了。